

本书编委会

主 编 陈支平 詹石窗

撰 稿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子宽 王日根 吴春明 张亚群 张先清
陈支平 陈进国 陈建娜 林 枫 林日杖
林国平 郑振清 饶志明 钱奠香 黄永锋
黄国盛 黄福才 盖建民 谢必震 詹石窗

凡摇例

- 一、本书凡引先秦诸子百家古籍 ,其出处仅注书名与篇名 ,如《论语·述而》、《尚书·洪范》。凡引两汉以来文集 ,若其书名中已经出现作者名者则其前不再加注作者名。
- 二、本书所引《二十五史》 ,均略其作者名 ,仅注出书名、卷数、篇名。其余古籍 ,凡作者可考者则注明之。
- 三、依照出版规范 ,本书所引用民国以前古籍凡涉及卷数等数目字 ,维持原有汉字表达式 ,民国以后者则用阿拉伯数字 ;但如果是作为一般统计数字的 ,则仍然用阿拉伯数字表达。
- 四、地方志依学术界惯例 ,直接在其前冠以刊刻年代 ,如“嘉庆《惠安县志》”等。
- 五、家谱、族谱 ,凡地域可考者 ,乃冠其前 ,如庐峰《蔡氏族谱》 ,其刊刻年代刊刻者则列之于后 ,如“顺昌《谢氏宗谱·霞标公轮流收办祭簿记》 ,道光三十年撰”。
- 六、本书之行文 ,凡涉及年号等传统干支纪年 ,在其后加上公元年作为说明 ,其括号内“公元”二字省略 ,如“太和丁未”

(公元年) ;再如“咸和元年”(公元年)。年号纪年之后括号内的数目字即表示公元年。若属于公元前者,则在其前加上“前”字,如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元年)。至于人物生卒年,一般也在其人名之后加括号说明之,括号内的阿拉伯数字即是其出生或者去世之年。

目 录

导 论	(员)
一、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生态的基本含义	(员)
二、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生态的多重结构	(苑)
三、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研究的价值与思路	(员源)

第一编 地理环境对东南文化经济的物质前提

第一章 地理环境的形成及其生态结构	(猿)
一、地质变迁 : 环境的物质根源	(猿)
二、地形地貌 : 环境的外在表征	(猿)
三、气候土壤 : 环境的郁郁生机	(源)
第二章 地理环境与东南开发	(源)
一、东南交通 : 经济文化流布的前提	(源)
二、东南开发 : 后来居上	(缘)
第三章 地理环境对经济的影响	(远)
一、山海并进 : 经济发展的基本途径	(远)
二、商品经济 : 东南区域发展的突出标志	(苑)

第二编 摇汉越合韵 摇东南文化经济的社会基础

第一章 摇“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结构中的中原与东南	(怨园)
一、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的形成	(怨园)
二、上古华夏文明社会的成长与东南社会的落差	(怨园)
第二章 摇百越先民在东南的繁衍及其文化源流	(怨园)
一、汉文史籍所见东南百越先民的繁衍与变迁	(怨园)
二、考古学所见百越及其先民的文化源流	(怨园)
第三章 摇中原文化的传播及其与古越文化的碰撞交融	(怨园)
一、华夏与汉文化传播东南的历史进程	(怨园)
二、中原文化与古越文化的交融	(怨园)

第三编 摇宗族繁衍 摇东南文化经济的凝聚纽带

第一章 摇东南宗族的历史脉流	(圆园)
一、初民文明与宗族	(圆园)
二、汉唐土族流移	(圆园)
三、宋元明清的新宗族	(圆园)
第二章 摇东南宗族的多缘联结	(圆园)
一、血缘纽带：凝聚家族组织的核心	(圆园)
二、地缘纽带：血缘扩展的空间保证	(圆园)
三、利益纽带：宗族组织联络的脆弱形态	(圆园)
四、客家和少数民族的附会	(圆园)
第三章 摇东南宗族与文化经济发展的关系	(圆园)
一、东南宗族与经济发展	(圆园)
二、从社会层面看宗族的经济组织作用	(圆园)
三、从文化建设看东南宗族在社会经济中的辐射功能	(圆园)
四、东南宗族的外播与内延	(圆园)

第四编 海上交通与东南文化经济的发展生机

第一章 探险猎奇与东南海上通道的开拓	(四四)
一、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航路开辟	(四四)
二、海上交通发展的转折时期	(四六)
第二章 东南海上交通网络与社会经济的繁荣	(四六)
一、东南海上交通网络的形成	(四六)
二、福建与琉球航海交通之关系	(四八)
三、明后期漳州月港的历史地位	(四八)
四、明清台湾对外交通与厦门港崛起	(四九)
五、海上交通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五〇)
第三章 东南海上交通与中外文化交流	(五〇)
一、东南海上贸易举要	(五〇)
二、东南海上贸易与伊斯兰教、摩尼教之流布	(五一)
三、东南海上交通与传统生产技术文化的外播	(五一)

第五编 海商贸易与东南文化经济的阴阳错综

第一章 东南海商形成的人文地理与经济政治条件	(五二)
一、东南海商形成的基本条件	(五二)
二、东南海商形成条件的作用方式与效果	(五三)
第二章 东南海商的发展道路	(五三)
一、汉唐宋元时期东南海商的成长历程	(五三)
二、明清时期东南海商的发展强盛	(五四)
三、近代以来东南海商的变迁转型	(五五)
第三章 东南海商的性格特征与归宿	(五五)
一、多阶层的商人组合	(五五)
二、乡族势力与商人集团的结合	(五六)
三、亦商亦盗的“犯禁式”经营观念	(五六)

四、内外联结与山海兼顾	(源源)
五、海上贸易与移居海外的相互促进	(源源)
六、东南海商亦梦亦幻的归宿	(源源)

第六编 摇五口通商 摇东南文化经济的连锁驱动

第一章 摇五口通商的内部动因	(源缘)
一、康熙朝开放海禁后的通商趋势	(源缘)
二、鸦片战争前后东南社会的通商需求	(源源)
第二章 摇五口通商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趋势与各口 摇摇摇摇通商状况	(源缘)
一、多口通商后的发展趋势	(源缘)
二、广州口岸通商状况	(源缘)
三、厦门与福州口岸通商状况	(源源)
四、宁波口岸通商状况	(源源)
第三章 摇五口通商时期的外商与华商	(缘园)
一、五口通商时期的外商	(缘园)
二、五口通商时期的华商	(缘源)

第七编 摇理学教育 摇东南文化经济的网络硕果

第一章 摇理学的渊源及其在东南的早期活动	(缘园)
一、圣学心传 理学在中原的孕育与成形	(缘源)
二、道南一脉 中原理学在东南的早期传布	(缘源)
三、理心之间 东南朱学、陆学、吕学之互动	(缘园)
四、两峰相峙 宋元朱陆二学在东南的尊显与分传	(缘园)
第二章 摇明清时期理学在东南的转变与式微	(缘源)
一、亢龙有悔 朱学在东南的演变与衰颓	(缘源)
二、见龙在田 心学在东南的崛起与传播	(缘源)
三、异端之尤 反理学思潮在东南的震荡	(缘源)

第三章 瑶理学的文化规范与东南的社会经济变迁	(远苑)
一、角色的转换 理学教育在东南社会的推行	(远苑)
二、理性的驰驱 理学对东南家族制度及宗法伦理的影响	(远苑)
三、义利的相容 理学的文化规范与东南家族的经济伦理教育	(远苑)

第八编 瑶宗教统绪瑶东南文化经济的人性映射

第一章 瑶道教在东南的流布与发展	(远猿)
一、东南道教的形成和初传	(远猿)
二、东南道教在中期的兴盛	(远猿)
三、明中叶以后东南道教的衰微	(远猿)
第二章 瑶佛教及其他外来宗教在东南地区的播衍	(远猿)
一、东南佛教	(远猿)
二、东南基督教	(远猿)
三、东南伊斯兰教	(远猿)
第三章 瑶东南宗教的文化经济作用与现实意义	(远猿)
一、东南宗教的世俗化道路与寺观经济变迁概况	(远猿)
二、东南宗教与经济互动诸形式之分析	(远猿)
三、东南宗教经济的区域化和现实意义	(远猿)

导摇论

摇摇“中国东南”这是一个魅力巨大、引人入胜的地理方位概念。因为这块曾经被冠以“蛮荒”之称的神奇土地在中古时期开始成为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从某种意义上看，“蛮荒”本身就是够刺激的，它意味着一种野性的神秘感；当这种“野性”由于文明的进军而迸发出固有的生命岩浆时，随之而来的社会风情变迁、经济开发、文化流布便具有了一种特殊的亮点，这些内容与远古茂密的森林、奔泻的河流相对应，组合成为特殊的自然、人文风景线，令人神往。

对于中国东南的地理范围，向来有不同定位，本书所谓“东南”主要指浙江、福建、台湾、广东诸省，并延及江西、安徽、江苏南部以及湖南东部区域。

俗话说：“一方土地养育一方人氏，一方人氏创造一方文化”。中国东南文化是在中国东南这块神奇土地上孕育产生的，其诸多形态蕴含着东南的自然地理本色，也凝聚着社会经济的固有能量。透过东南文化反射镜，我们还可以感悟到深层次里所存在的人性主体品格以及特定的社会价值观。

一、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生态的基本含义

从根本上看，全世界的文化作为生活体验与社会劳动实践的结晶，都是人的创造本性的表现；然而，作为个体的人和生活于一定群体中的人由于环境不同，也就具有不同的生活体验和特定的社会劳动实践。

这种具体性决定了文化的类型区分。生存于不同区域的人由于环境的作用和血缘宗法关系,以各自不同的形式创造文化,从而使文化具有民族性与区域性。中国文化之所以与其他国度的文化有许多不同,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就与中华民族所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休戚相关,这种民族性与区域性正是它能够存在并且获得独立发展的特色所在。

正如“环境”具有相对意义一样,“区域”也是相对而言的。以地球范围来看,亚洲、欧洲、非洲、澳洲、美洲属于区域;以亚洲范围来看,中国国土便是区域。依此类推,中国版图之内的任何一方都可视为区域。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有所谓东西南北“四正方”与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维方”的区域划分。“中国东南”正是基于这样的方位认识而建立的概念。不言而喻,“中国东南”这个概念绝非仅就地理而言,它的形成还有其特定的文化依据。在这个区域中的人们因其特殊的环境形成了特殊的文化,这种文化属性使该区域不仅在地理上与其他区域相互区别,而且在精神层面上也具有自身的特色。这就是本书为什么将中国东南文化经济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理由。

(一)关于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生态的概念说明

就宗旨而言,本书不仅要探索中国东南文化的诸多类型,而且要研究其深层次结构。从整体结构来说,东南文化是复杂的;但就重心而论,该区域文化经济之互动关系应该说是最令人瞩目的。在宏观上,中国东南文化经济也可以作“生态”来看。因此,以生态学的立场来观照中国东南文化经济也就有其必要性。

学者们知道,生态学是关于“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它是由德国人哈克(恩斯特·哈克尔)于1869年提出来的。后来,许多学者加以丰富和完善。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生态学已经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学说而广为应用。生态学的内容相当丰富,其核心问题是关于生态系统的理论。英国学者坦斯利(英国生态学家)指出,生态系统的基本概念是物理学上使用的“系统”整体,这个系统不仅包括有机复合体,而且也包括形成环境的整个物理因子复合体。根据这种理论,生态系统包括有生命的成分和无生命的成分。有机体与环境各组成部分之间并非孤立存在、静止不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并且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在生态系统中,一种因素的变化会引起相关因素也

跟着变化,甚至影响到整个生态系统的结构。这种理论本来是用以解释和说明自然存在状态的。随着人类环境问题与环境科学的发展,生态系统的认识范围被扩展开来。于是有了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等诸多概念。

如何认识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的生态结构呢?这个问题牵涉到什么是文化生态、中国东南文化生态、文化经济生态、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生态等一系列概念。为了方便论述,笔者拟对这些基本概念略作说明。

由于文化本身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文化生态也就有广义与狭义的解释。从广义上说,文化生态是指社会范围内所有文化资源、文化现象、文化成果等等诸多因素所形成的状态结构以及这些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产生的作用功能;或者说这是指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水平、状态、结构、关系、功能。从狭义上看,文化生态主要是指作为社会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的哲学、宗教、教育、文学、艺术等的存在状态、内在精神及其相互关系。在狭义的文化生态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人们的社会心态。这是因为作为社会意识典型表现的社会心态虽然与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有关,但其深层次上却是社会文化历史积淀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心态是狭义文化生态的核心部分,从社会心态的情形可以发现文化生态的本质内容。不论从广义上或从狭义上看,文化生态也和自然生态一样,是人类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有机、有序的亚系统,其运动是有目标、有规律、有秩序的,并拥有相当能力的自调控、自变动机制。^①

基于文化民族性的事实,文化生态的形成也与特定人群的生活体验、劳动实践密切相关。从这样的事实出发,“中华文化生态”的概念也就可以成立。因为“中华”在客观上标志着华夏族群统一体,所以由这个族群统一体所创造的文化便具有民族性,其文化生态当然也就具有华夏族群的生活体验与劳动实践印记。就汉语而论,“中华”与“中国”的意义是不同的。如果说“中华”是对华夏族群的指称,那么“中国”则是对华夏族群所生活的国度的指称。一般地说,构成国家的因素不仅有人口,而且有土地疆域、军队和管理制度。在构成国家诸多因素当中,族群人口是最为重要的,土地之大小、军队之多少、制度的设立

^① 参看王长乐《论“文化生态”》《哈尔滨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都因族群人口的生存需要而定。许慎《说文解字》称：“國，邦也，从口从或。”国字，繁体作國。外形的“口”象征着疆界，戈是武器，引申之则为军队；里面的小口，即指人口，口之下一横象征土地。根据此等训诂，“中国”的形成本身就具有相当复杂的文化内容，它涉及民族历史、社会制度、精神生活等。当我们说“中国”的时候，首先意味着是版图疆域，其次则意味着存在于这个版图疆域中的一切。而说“中国文化”则表述在中国疆域内所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属性和地理意蕴的文化创造。在内容上，它包括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正如其他疆域产生的文化存在着一定的生态结构一样，中国文化也具有生态结构。“中国文化生态”这个词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提出的。作为一个国家整体，中国的版图是不可分割的；但就构成而言，中国也与其他国家一样具备了特定的区域划分。作为中国的重要区域，东南所存在的文化是整体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故而东南文化生态便具有中国文化生态的一般特性。有人说“一滴水反映了太阳的光辉”，这用以形容东南文化生态与中国文化生态的关系应该说是合适的。不过，“水”毕竟不能等同于“太阳”，我们不能在“东南文化生态”与“中国文化生态”的概念间直接划上等号。基于中国文化生态的整体性认识，“东南文化生态”这个术语的使用即意味着存在于中国东南区域的诸多文化要素的状态、结构、关系、功能。

鉴于“中国东南文化生态”与“中国文化生态”的关系可以从整体与区域的关系角度加以认识和解释的逻辑事实，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来说明“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生态”的术语内涵。就构词法则来说，“文化经济”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作为偏正词组看待，另一是作为并列词组看待。前者意味着以“文化”修饰“经济”，即“文化”是内涵，而“经济”是落脚点；后者表示“文化”与“经济”处于同一台阶，不互相隶属，但却存在密切的交错关系。作为偏正词组的“文化经济”说的是一物，归根结底是“经济”，作为并列词组的“文化经济”说的是特殊的两物，或者说联体的两物。比如说，我们经常使用的“科学技术”就是一个并列关系的词组，这个词组所代表的是“科学”与“技术”的共同存在。第二种意义的“文化经济”与“科学技术”的用法是一致的。笔者所谓“文化经济”是在并列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之所以称作“文化经济”，是因为从宏观立场看，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非常密切，它们的存在是一体化的。作

为联体存在现象的“文化经济”因所处国度不同而有自身特色；“中国文化经济”的提法意味着中国特色的“文化经济”。基于区域可大可小的道理，可以将“中国文化经济”区域化为中国东南文化经济、中国西南文化经济、中国东北文化经济等不同的部分。正如中国东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区域性的生态一样，联体存在着的中国东南文化经济在事实上也建构了区域性生态。

（二）从生成互动看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生态

中国东南文化经济之所以构成一种区域生态，是因为文化经济作为联体存在的社会现象本身具有互动生成的关系。如果说文化在广义上涵盖了人类的一切创造、传承及其成果，它体现于人类的创造物和人类的自身活动，那么经济则可以相应地看做是以生产为起点，包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个环节在内的全部人类活动。^① 根据这种认识，则中国东南文化便意味着生活于中国东南区域中的人们所承袭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依此基础所进行的新的创造过程、成果；同样道理，中国东南经济是发生于中国东南区域内的具备了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环节的人类活动。如此一来，我们发现中国东南文化与中国东南经济之间一开始就存在由此达彼的桥梁，因为在形态上两者都体现为人类活动过程与成果，这说明其间存在着彼此联体的客观可能性。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可能性可以转化为现实性，当转化成为一种事实的时候，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生态也就孕育生成。

中国东南文化经济存在着相互派生的内在资源。因为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人类最初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以群体行动的方式构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他们与猛兽搏斗，从而取得食物，这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经济活动，他们袭击野兽，将捕捉的野兽的皮肉分割，显示了初步的生产行为。当先民们在休息时以模拟的方式再现捕捉野兽、采摘野果之类经济活动的场面时，原始的歌唱、舞蹈等艺术文化即应运而生。这种艺术文化并非原始人有意追求的结果，而是经济活动之余偶然出现的，因此具有派生的性质。随着社会的变迁，人类的经济活动也逐步向高级形态发展。这不仅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展

^① 见王恒富、石争主编《文化经济论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 页。

展,而且推动了精神文明的升级。例如人类为了吃、喝、住、行而创造的各种食品、饮料、房屋、车辆既是物质产品,具有经济属性,但又蕴含着人类的创造智慧,引发了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住所文化、交通文化、旅行文化等等。这说明,经济活动是文化创造的推动力。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认为是经济活动派生了文化。但是,事物的相互作用并非固定于一种方向。经济活动与文化创造的派生关系也不是单向的。纵观人类生活历史,我们发现,文化创造也可以派生出经济行为,产生经济能量。就文化形态而言,无论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派生出经济活动。因为物质文化是从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它一旦形成就具备了稳定的导向,这种导向就是制作为人服务的器物;制度文化着重于管理,其中包括了生产制度、消费、分配制度,管理的导向是为了提高经济活动效率,保证经济活动的合理性;精神文化对于人们的经济生活的派生作用虽然没有那么直接,却可以提高生产者的素质,从而转换成经济生产能量。在商品社会中,精神文化往往以物化的形式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流通,其物化的过程与流通过程也具备了经济活动行为。这些方面都证明了文化与经济是可以互相生成的。中国东南文化经济当然也符合这种相互生成的规律,因为中国东南文化经济与其他区域的文化经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在东南社会人们的现实生活中,照样运行着文化经济相互生成的法则。

中国东南文化经济又是互为环境、相互制约、相互推动的。任何一种事物都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反过来说,没有环境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中国东南文化经济也是如此。不论是东南文化还是东南经济都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在一定条件、一定背景下存在和发展的。所谓条件、背景,概括而言就是环境。这种环境的属性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对待、相互转化的。一方面,东南经济的发展兴盛或萧条等状态成为东南文化存在、发展或衰落的环境;另一方面,东南文化的发展兴盛或萧条也成为东南经济存在、发展或停滞、衰落的环境。这就是说,环境的意义并非都是积极的,也会有消极的。所谓“相互制约”正是基于环境对于事物存在发展而言具有利弊两个方面作用说的。至于“相互推动”,其着眼点乃在于积极方面。当东南文化成为环境生态的主导因子时它的变化发展明显地作用于东南经济,推动了东南经济的发展;反过来看也一样,当东南经济成为环境生态的主导因子时,它的变化发展

也就促进了东南文化的发展。例如早期移民阶段的福建,虽然经济比较落后,自然条件恶劣,但从中原迁移而来的土族却具有比较先进的文化,他们重视教育,胸怀文化传播的使命感,积极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承,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当时社会经济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土族们从中原带来的文化成为早期福建开发的主导因子。像这样的例子在山东、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也是存在的,因为这些省份也曾经历了从中原移民的历史,所以有许多相似之处。再说,当东南区域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它也成为社会进步的主导因子,在客观上推动文化的发展。例如南宋时期,东南地区由于经济的繁荣,文化也相应地繁荣起来。当时福建的经书印刷相当发达,其流通非常广泛,不仅在中国疆边远地区可以看到福建印刷的经书,而且在日本、韩国等地也流行着福建印刷的儒家、道家、佛教等传统经籍,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文化交流的频繁,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东南社会的繁荣。南宋以来,中国东南的文化繁荣是离不开经济推动的。如果说,那时生活于东南区域的人们大部分无法解决温饱问题,那是不可能大量印制传统经书的。

二、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生态的多重结构

从性质上说,生态强调的是整体性,也就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共同系统性。但是,整体又是由个体构成的。所以任何生态圈也就有其内在结构。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生态当然也体现了整体与个体的对立统一关系。当我们指称“文化经济生态”时,一方面意味着文化经济的整体存在,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整体的内在结构及各结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样道理,当我们使用了“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生态”时便意味着生态系统关于整体与结构因素关系原理在一个特定区域中的表现。如果我们把整体当做“一”来看待的话,那么生态系统中的各种因素以及组合结构则可以相应地看做是“多”。

(一)从内容上看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生态的多重结构

我们知道,文化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产生的,离开了地理环境是

无法解释区域文化特色的。但是,文化又是在一定社会中存在的,没有社会的文化是不可想像的。这样,文化不仅与自然结构发生某种对应,而且与社会各个层次的人群发生密切关系。直接地说,文化是因社会各个层次的人群的生活与生产劳动之联系而发生的,而人的生活与生产劳动是以自然生态环境为发生前提的,因此文化生态的背后有自然环境生态作为支撑。从这个角度看,在大文化生态圈中蕴含着一个潜在的自然生态系统。在人没有产生之前,自然生态系统就已经存在并且依照其固有规律运动着,在这个系统中进行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与信息传递。在人类出现之后,自然生态系统的运动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不仅作为自然生命网中的一部分参与了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与信息传递,而且因其智能的超群而对自然生态系统发生重大影响。因此,在人类形成之后,自然生态系统便具有明显的“人化”痕迹,例如河流堤岸的建造、矿产的开采、树木的栽种等等。这些因素构成了文化经济生态的自然基础。中国东南当然也存在着这样的基础。因为生活于中国东南的人们照样以其特有的智慧来利用自然资源为其生存与发展服务,于是中国东南固有的自然环境便打上了该区域人们的精神烙印。无论这里的土地、河流,还是人工栽培的树木花草,都已经不是史前时期的状态。就此而言,当我们认定世界上因人类的智能作用而形成了特殊的自然文化层的时候,同时也就意味着区域自然文化层的存在。根据这样的逻辑,中国东南存在着自然文化层的说法也是在理的。这个文化层从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中国东南人们的劳动精神。利用东南地理生态中的诸多条件来为生存和发展服务的人们,当他们因为生活和劳动而结合起来的时候,这又意味着一种映照区域地理之光的组织形态的存在。该区域因其组织活动而形成的一系列以管理为核心的文化也就是东南社会文化。在特定的组织系统管理下,该区域的人们进行物质生产、物质分配、物质流通、物质消费一系列经济活动。因具体生活之需要和历史条件之许可,东南区域中的人们或者从事农业、或者从事手工业,此等活动尽管门类不同,但都具有经济性质,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即是东南经济文化。此外,东南区域的人们当然也建构着具有区域特色的精神文化。从自然文化到社会组织文化,从经济活动到精神文化,这些内容以其各自的作用而处于东南文化经济生态总体结构中的不同层次,它们既有相互区别的一面,又有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

一面。

(二)从历史发展看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生态的多重结构

就内容方面考察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的生态结构,那只是一种角度而已,并非惟一角度;事实上,任何一种事物都无法离开时空而存在,以此来观照中国东南文化经济也就必须将特定的内容置于历史流程之中来加以审视。

既然我们把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结构看做一种区域生态系统,这就不但承认这个系统存在着种种生态因子,而且承认诸多生态因子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可以把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生态结构分为自在生态、自为生态、磨合生态三种形式。

自在生态是指文化与经济的互生功能尚处于模糊状态,人们对于经济活动与文化创造还没有自觉的划分意识。这样的情况在人类历史上无疑是存在的,因为早期人类本来就没有把自己同自然分开,模糊观念贯注在他们的生活之中。换一句话来说,那时的文化创造与经济活动无法划一道明显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那时所形成的文化经济结构是一种自在生态。这种自在生态是否也在中国东南区域中存在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东南区域与中原地区相比虽然在总体上开发得较晚,但是在汉族大量迁来此地之前,三苗、百越等土著民族却早已在此处生存活动了。正如世界上其他许多土著民族一样,东南区域的许多土著族群也在生产与生活过程中自在地造就了他们拥有的文化。据有关学者考证,浙江余姚即属于古越族生活区域之一。1978年,考古学家曾经在此处发现了举世瞩目的河姆渡文化遗址。该遗址所存的许多生产工具以及生活用品所代表的年代比仰韶文化最早的遗存——半坡类型年代还要早。我们虽然无法断定河姆渡的各种各样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就是百越先民的遗存,但大量的实物却证明了东南早期的文明进程。值得注意的是,河姆渡地下发掘出来的器物当中大多带有雕刻装饰艺术。像牙雕蝶形器,以扁平的象牙片磨制而成,形同蝴蝶。制作者于蝶形器上钻有若干对称小孔,正面往往精刻太阳纹或鸟纹,尤其典型的是“双鸟朝阳”纹形器。该形器虽然上半部分残缺,底端也稍微残损,但正中的图案却清晰可辨:中间一组由五个大小不等的